

德国著名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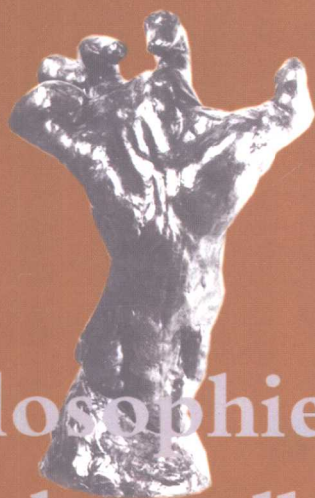
[德] L.J. 庞格拉茨主编

J. 埃宾豪斯等著

张 慎 等译

下册

自述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東方出版社

德国著名哲学家

（德）L.L. 施特劳斯 编

王德峰 译

陈 燕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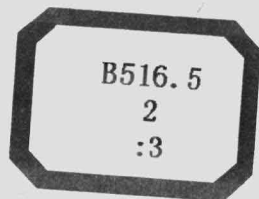
李 楠

自述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德）施特劳斯 编



德国著名哲学家

自述

[德] L.J. 庞格拉茨主编

J. 埃宾豪斯等著

张 慎 等译

下册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东方出版社

© Felix Meiner, Hamburg

本书中文版由德国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授权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8-2768~277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著名哲学家自述/[德]E. 布洛赫(Bloch, E.)等著;[德]庞格拉茨(Pongratz, L.)主编;张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2
ISBN 7-5060-1208-1

I. 当… II. ①布… ②庞… ③张… III. 哲学思想-德国-现代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820 号

德国著名哲学家自述

DEGUO ZHUMING ZHEXUEJIA ZI 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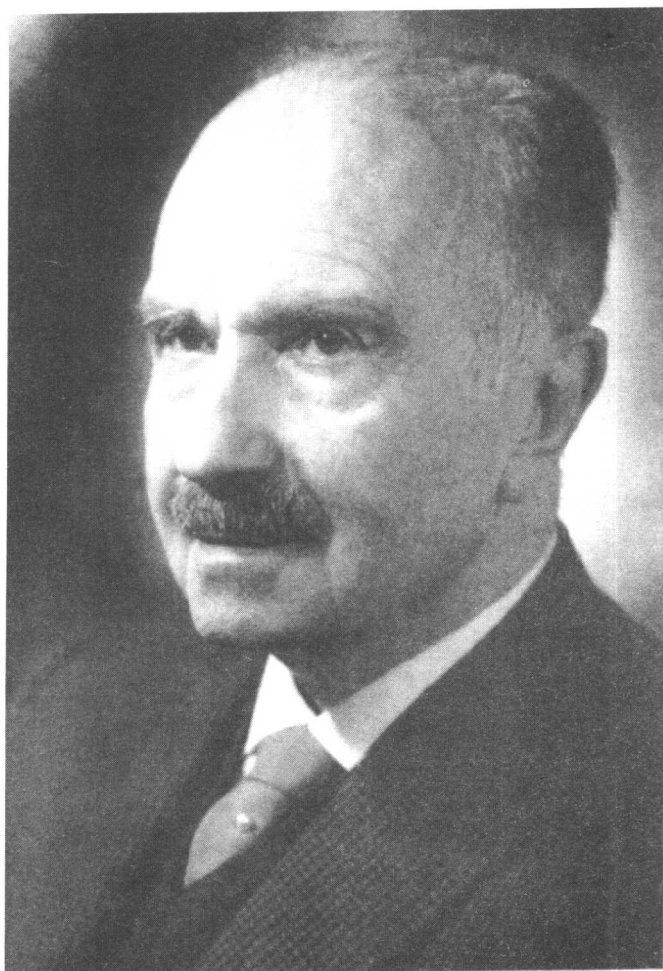
[德]E. 布洛赫等著 L.J. 庞格拉茨主编 张慎等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30.875 插页:21
字数:711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1208-1 定价(上中下):70.00 元



尤利乌斯·埃宾豪斯

J. Ebbinghaus.

本书是20世纪23位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的自传，主要讲述他们“经历过的与认识到的”。

本书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其原创性。本书文章均由不同流派、不同学派的哲学家自己写成，这使得本书同那些由别人写成的传记或教科书区别开来。读者可以通过哲学家本人生动的描述，经历哲学不同的心理起源，面对不同的理论观点和解释立场，并受到激发，对它们进行比较、讨论及形成批评性判断，感受哲学的“生生不息”。

哲学对今天的研究者，对今天的人类有什么话要说？让我们聆听哲学家自己的言说吧！

责任编辑：刘智宏
田士章

特约编辑：张 英

版式设计：程凤琴

封面设计：颜国森

目 录

- (1) 尤利乌斯·埃宾豪斯
- (52)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
- (91) 海因茨·海姆塞特
- (120) 埃里希·亨特尔
- (171) 弗里德里希·考尔巴赫
- (214) 赫尔穆特·库恩

- (260) 人名索引
- (276) 名词术语索引
- (285) 译者后记

尤利乌斯·埃宾豪斯

1

(Julius Ebbinghaus, 1885.11.9 ~ 1981.6.16)

J. 埃宾豪斯生于 1885 年,在柏林和布雷斯劳长大,青少年时期受到身为学者的父亲的深刻影响。1904 年他开始在洛桑、柏林、哈雷、海德堡等地上大学,主修哲学,一度曾成为黑格尔主义的忠实信徒,后受海德堡新康德主义影响,开始转向康德哲学。1909 年他在文德尔班门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9 年在胡塞尔门下获得大学教授资格,随后开始在弗赖堡、罗斯托克、马堡等大学的哲学系任私人讲师、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出任重新开放的马堡大学校长。埃宾豪斯的工作重点是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伦理学等问题。他的思想和著作反映了德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民族及其命运的反思。这篇自述中有关他本人在爱国主义热情驱使下的两次参战经历,以及他和海德格尔的私人间友好交往,读来都令人感兴趣。

家父赫尔曼·埃宾豪斯(Hermann Ebbinghaus)出身于威斯特伐伦的一个家庭,其成员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从事纸张生产或贸易的企业主。他本人则是家庭中第一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当我1885年11月9日出生时,他正在柏林大学担任编外哲学讲师。他早年丧父,母亲是个甚为笃信宗教的妇女。她在这方面给孩子们施加的压力使得家父对一切正统观念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不过他仍坚持一种理智的、着眼于道德从善的宗教信仰,而且他对这种宗教信仰给予肯定的决心也感染了我。政治上他属于19世纪70~80年代著名的民族自由党的左翼。他爱国并且是俾斯麦的崇拜者。国内政治方面他不赞成普鲁士政府那种保守、教权主义的方针。由于对普鲁士国家忽视科学代表而重视军方和行政官员的行为感到恼火,他与好友弗里德里希·保尔森(Friedrich Paulsen)商定,拒绝接受也决不使用授予他的、对老教授来说很普遍的政府枢密顾问的头衔,同样他还拒绝接受授予他的四级红鹰勋章。他既不确认收到了这枚勋章,也不听从他乐于听从的勋章委员会的劝告。

在柏林和布雷斯劳——1894年4月家父应聘到此——读完早期预备学校后,我从三年级起在布雷斯劳的玛格达勒嫩文科中学接受学校教育。其结果是使我深信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育价值,此外在初等数学和法语方面也得到良好训练。1904年复活节我离开了文科中学,企图遵照父亲的榜样去学哲学,但没有得到他的半点支持。第一学期我赶时髦到了洛桑。接着于8月和9月在格勒诺布尔参加了假期短训班,在这里你可以在学校所学知识的基础上,不仅学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而且还可以通过参加既酷爱郊

游又风趣的语音学家保罗·帕西(Paul Passy)讲授的课程学说一口纯正的法语。

1904年10月,在没有得到家父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我到柏林大学读了两个学期,家父认为不太有名气的大学对初学者更合适。在那里我聆听了弗里德里希·保尔森讲授的哲学史、卡尔·施托夫(C. Stumpf)讲授的心理学和逻辑学以及埃米尔·瓦尔堡(E. Warburg)讲授的实验物理学这些主要课程。接着在家父于1905年秋受聘的哈雷大学就读了三个学期,以便有机会既聆听他讲授的主课心理学又可以听一堂长达四个小时的精彩的哲学史讲座。在研讨课和练习课中我继续学习实验物理学。此外我还听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这两门主课。

在此期间我产生了一个愿望,即通过在一位某流派代表人物那里的学习来了解当时德国流行的某个主要哲学流派。我渴望到弗赖堡去。在我看来在那儿任教的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以及《知识的对象》这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独立论述人的知识的基本问题的特色。然而家父看清了李凯尔特内向反思的空洞无物,劝我到海德堡去而不要去弗赖堡。他不无理由地预测,博览哲学史比李凯尔特无创造性的专事概念分析的形式主义对我的哲学学习更有裨益,而在海德堡工作的威廉·文德尔班的著作则是哲学史的见证。

在此期间我不再是哲学讲座的一名纯粹中立的听众了。从最开始我学习的主导思想就是查清在现有的所有这些哲学中究竟哪些是正确的。或者说,哲学家探索的那种认识一定能被找到吗?我高兴地拜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然而更多地是把它作为一种引人入胜的想像力的产物而非认识的产物来读。我试图借助保尔森在弗罗曼经典系列丛中发表的关于康德的专

著了解康德,然而我既没有弄清《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问题的动机,也对此不感兴趣。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在哈雷读第四学期时,我聆听了当时担任哲学编外讲师的弗里茨·迈迪库斯(Fritz Medicus)关于费希特的一个讲座,它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报告人本人异乎寻常的献身精神。从内容上说它使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兴奋和激动的企图,即按照某些无可置疑的最高原则构筑一个哲学体系。文德尔班的前奏曲中有句格言:理解康德就意味着超越康德;人们可以把决心重新研究费希特 1794 年的知识学以及 1797 年的那两篇知识学引论视为使进入海德堡研究班圈子的行为合法化。

正是这个圈子使我马上面临一种新的诱惑,它诱使我在我认为应当走的道路上再向前迈进一步,如果哲学在整个科学领域里能再次成为一种普遍承认的角色的话。引诱者是文德尔班的博士生中的一位年长者。文德尔班在每个学期都邀请哲学研究班成员参加一两次晚会,我就是在一个晚会上遇到他的。我同他谈到过我的费希特主义。这位新相识就是奥托·克洛斯(Otto Closs)。

此人在柏林读书期间成为一名具有独特方式的黑格尔信徒。当时黑格尔的哲学传统在柏林大学尚未完全泯灭。以该哲学传统的追随者闻名的名誉教授阿道夫·拉松(Adolf Lasson),一个外行,用妙趣横生的地道的柏林方言为那位施瓦本人的事业进行宣传。此外还有历史学家德尔布吕克(Delbrück),从他 1924 年出版的《世界史讲演录》中可以看到他信奉黑格尔历史观的详细表白(见该书第一卷,序言第 9 页及以后几页),但是这种信奉表白更多地具有声明独立于兰克学派(Schule Rankes)的特征,而非具有作为对该著作基础的研究有用的原则的特征。那几年对黑格尔感兴趣的还有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当然以其他的方式。此人根据柏

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黑格尔青年时代手稿汇编于1906年在普鲁士科学院论文集中发表了《黑格尔青年时代纪事》。同时他的学生赫尔曼·诺尔(Herman Nohl)也在为黑格尔手稿的出版而忙碌。手稿于1907年出版。

然而对奥托·克洛斯而言,除了狄尔泰当时的学生圈子里具有仿佛黑格尔在场的那种气氛外,由于他同弗里德里希·布龙施泰特(Friedrich Brunstäd)于1905~1906年在柏林结成的友谊,还使他得到关于黑格尔的较为明确的提示。弗·布龙施泰特当时正准备他关于《黑格尔历史理论》的博士论文。在190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节选中,除了狄尔泰以外,他还提到他应当特别感谢的导师是拉松和德尔布吕克。在此期间他已于1907年请雷克拉姆出版社再版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并写有一篇包罗万象的序言。该书出版那年的7月,即我在海德堡的第一学期期末,这本由奥托·克洛斯亲笔题写了座右铭“我主即精神”的书赠给了我。赠书人似乎想用这种充满激情的题词责成受赠者为他所称颂的主效劳:即向由黑格尔揭示的世界精神效劳。 5

这时虽然我本人决不愿意无条件地放弃我的费希特式的原则,但这种新的友谊也促使我去深入地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本书吸引着我。它激励着我进一步研究1807年这本书出版之前已发表的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本人的著作。研究的结果就是我的博士论文,它经拓展和修改后于1910年在莱比锡由菲特-卡门出版社出版,题目是《相对与绝对的唯心主义——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之历史的和系统的研究》。

然而不管是提交给学院并以这种形式付印的博士论文还是为出版而拓展的文稿,都不能称作是什么历史的研究。其中惟一的历史研究就是摘自《纯粹理性批判》两个版本的引文目录,在这些

引文中康德表达了我们的一切表象在其潜意识中都由“我思考”这种表象伴随着。不幸的是,我不像康德把“我思考”理解为意识,这种意识能把感官意识到的所有杂多(知觉)在“我意识到”的那种意识(统觉)以及我本人的意识中结为一体。我认为可以而且必须把那种自我意识视为一切潜意识的源泉,甚至是我们的表象的一切潜在的多样性的源泉。

- 6 这表明我对唯心主义的要求太过分。但正是我的导师试图对康德的范畴论进行的修改使我坚持这种由我的费希特情结产生的唯心主义的绝对性,这一点却没有显露出来。文德尔班在为祝贺 C. 西格瓦尔特(Christoph Sigwart)七十大寿所出的论文集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范畴体系》的文章,文章的开头写道:“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来,综合的概念构成了一切理论哲学乃至一切哲学的最终原则。我们把综合理解为构成一切意识的基本特征从而也构成内在经验的基本事实的那种特殊的‘多样性的统一’”(《论文集》第 43 页)。相应地,文德尔班认为:“之所以能发现范畴体系的原则,是因为人们发掘了包含在多样性的综合统一本质中并成为详细解释其功能的前提的那些可能性。”(参见《论文集》第 47 页)按照文德尔班的解释,在多样性综合统一的本质中所包含的可能性应当根据对表象内容的多种可能的组合的“内在经验”而逐渐发展。但是他认为内在经验“首先表明综合是以相关功能与构成其对象的表象内容之间的对立为前提的。”(同上)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即不依赖受“我思考”制约的在感性直观中提供的杂多的综合,就根本不会有知性诸概念的对象,也不会有(外在或内在的)经验,这正是超越 1770 年博士论文立场的一大发现,它为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及其对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否决打开了大门。(参见康德 1772 年 2 月 21 日给马尔库斯·赫尔茨的信)

很清楚,文德尔班通过尝试从内在经验推导出范畴便排除了同康德批判主义的一切可能的联系。他以此标榜自己是那种“心理学至上论”的代表之一,而非别人标榜的是心理学至上论的反对者。他本人认为自己是那种反对者,这标志着当时哲学在涉及其自身的提问立场时已经处于更为混乱的状态。 7

这种混乱状态也导致我论述相对与绝对唯心主义的那篇博士论文的题目和论点都不清晰。我当时根本想像不到刚才所说的文德尔班的范畴论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相反,我以为可以把这两种基本观点都纳入“相对唯心主义”这个概念之中。这种归纳使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其原因在于我没重视对康德先验唯心主义来说是重要的、作为我们内外在直观的先天形式的时空学说。我忽略了它们,尽管我不是文德尔班的弟子,但还是步了他的后尘。因为尽管文德尔班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坚决地反对康德的先验美学,但是由于他把范畴解释为“相关思想的形式”或“包含在杂多的综合统一性本质中的可能性”(《论文集》第 47 页),所以他明显地不重视先验美学。与此相对,康德把范畴解释为“关于一般对象的概念,由于考虑到某种逻辑判断功能,所以对象的直观被视为是确定的”(《纯粹理性批判》第 2 卷第 128 页,参见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蓝公武译本第 98 页。——译者注)。略加思考就会发现,这种不涉及先天直观形式可能性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思考也表明,没有直观的内外感官的先天形式,在产生多样性的表象与统觉的先验统一之间的那种客观联系是不可想像的。 8

我认为,用那两种要素的类似动态的更替过程的理念来代替自我意识与哲学家头脑中的那种多样性东西的主观并立——明显地依靠费希特在他的 1794 年知识学中用来规定自我与代表着表象可能情况的非我关系的那个“交替行为和忍受”——这样就能够

摆脱上述困境,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困境。无论如何我认为用这种理念已经排除了哲学家的意识作为联合那两种要素的必要条件,并且也消除了自我意识的统一性与产生多样性的表象之间“一成不变”的对立。正是用这个“一成不变”使我发现了康德的“相对”唯心主义与由费希特的辩证法所开创的“绝对唯心主义”的界线。这里我不仅忽视了与康德“先验”唯心主义不同的“绝对”唯心主义已假设了对相互作用这个范畴的现实使用,而且也忽视了它使我除了毫无创见地接受由我导师首创的统一性(自我意识)与多样性(现有的表象)这两个要素无止境的可能的作用和反作用外不再掌握任何其他东西。

- 家父未能活到1909年春夏,也就是说,没能活到我起草博士论文和准备博士论文答辩那个时候。前一年,他还和家母一起去参加了1908年9月在海德堡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哲学大会。在大会结束的宴会上,流亡到美国哈佛的心理学家胡戈·明斯特贝格(Hugo Münsterberg)致祝辞,他对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学派的意见一致。他还信奉洛茨(Lotzes)的“价值哲学”。当他致祝辞讲得兴致正浓并准备表白他对这一哲学的信仰时,他的舌头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去赞赏价值哲学,反倒赞赏起海德堡流行的“语词哲学”来。这个口误引起的哄堂大笑显然有助于提高家父的声望。他似乎感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由于他参加这次哲学大会而给我造成的损失给予的补偿。
- 9

1908年底、1909年初,我阔别家乡一年之后,在家里过圣诞节期间最后一次见到家父。我对那几天中我们在平安夜进行的促膝谈心依然记忆犹新。谈话的主题是文化政策,尤其是家父认为“太黑暗”的普鲁士文化部的大学政策。实际上,1906年为反对中央集权而组建的“比洛夫联盟”带给帝国总理的是一个脱离中央集

权、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但是在普鲁士州议会中,由于现行的三级选举法,以资产阶级多数派为主、取消中央集权则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对中央集权要求的容忍取决于当时的力量对比,而当时普鲁士政府根本无力改变这种力量对比。

我本人则在我的那些信奉黑格尔哲学的朋友影响下从家父遵循的民族自由主义路线继续向右转。家父对我思想上的这种与黑格尔哲学相关的离经叛道,有时会当着我和其他人的面以父亲般的冷嘲热讽加以评说。但他也随时准备在说理的基础上认真地与我们交换看法。

1909年2月26日,在他年满59周岁后刚过几周,他突然出人意料地死于肺炎。他患有血栓病,常常谈起他会早亡。我接到电报赶回家,他已经咽气了。

葬礼过后不久,我于3月1日回到海德堡。1909年7月14日我在海德堡通过了博士考试答辩。我的主科哲学的主考官是文德尔班,副科物理是阴极射线的发现者莱纳德(Lenard)。我选择美术史作为第二副科。这一科的主考人是亨利·托德(Henry Thode),他不仅是位美术史学家,还因支持不受法国印象派影响的“德国的”伯克林(Böcklin)和托马(Thoma)的绘画艺术以及为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事业和拜罗伊特节日汇演作巡回报告而闻名。

后来我总是劝我的那些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选修数学作为除物理学外的第二门副科。我本人也在哈雷和海德堡聆听了数学的主要讲座(微积分、解析几何、代数等),再后来我有时还自学,有时在具有全面数学知识的朋友的帮助下学习这些课程。尤其是从掌握技术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对那些哲学博士生来说数学与物理学搭配是最自然的。

当然哲学“专业”所需要的补充教育根本不能用某几种可以学